



一路走来

相伴六十载

□任崇海

我从1958年开始成为《盐阜大众报》的读者,并撰写新闻稿件,后来被报社聘为通讯员,至今已经过去六十余载,与《盐阜大众报》和《盐城晚报》的联系从未间断过。

我是1940年出生在盐都大冈镇抬头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。1952年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上初中,1955年升入高中。然而在江苏省盐城中学读高二时,我不幸摔了一跤,跌断左腿而离开了心爱的学校,“大学梦”化为泡影,我的精神极度消沉,家乡的小学校长和大队干部把《盐阜大众报》送给我阅读,我走上了新闻写作的道路。我还记得,开始时写了几十篇,都是石沉大海,老校长鼓励我说:“有志者事竟成,贵在坚持!”终于在1958年8月的一期《盐阜大众报》上刊登了仅有20个字的顺口溜,至今这篇顺口溜还保存在我剪贴簿的首页上。后来,领导先后安排我做民办教师、中学职员等工作。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充分利用业余时间,采写新闻稿件。尽管自己腿部残疾,经常拄着双拐,走村串户,出现在田间地头采访。大冈是水网地区,河多小木桥多,拄着双拐不好过桥,我就从桥上爬过去。那时写稿可不像现在敲键盘,而是要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。尤其是用复写纸复写,一式五六份,上下十几层,要靠一定的笔力,我的指头上至今还留有厚厚的老茧。艰难的付出,换来了稿件质量的提高和用稿率的上升,被《盐阜大众报》聘请为通讯员,还多次被授予优秀通讯员的荣誉称号,乡亲们热情地称我是“土记者”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冈公社成为闻名全省、全国的先进典型,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从事专职宣传报道工作。这时,我与《盐阜大众报》等新闻媒体的联系频繁,见报的稿件比较多,那时的大冈公社报道组,后来以“华海明”“成海明”(集体笔名)的署名风靡盐阜大地,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刊登稿件厚厚的剪贴簿。当年报社定期举办通讯员培训班,报社领导经常带领学员到大冈公社进行现场采访,我都陪同。有一次,我陪同他们到离公社所在地十多里路的光华大队采访。采访结束返回时,半路上我腿痛得不能走了,是学员们把我背回来的。如今我还保存着当年培训班学员到大冈公社采访时的合影。

《盐城晚报》创刊后,我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,成为其忠实读者,并坚持不懈地向其投稿。1998年,我采写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嫁给一位四肢不健全的青年,三十载人生风雨仍真情不变,她用“双手撑起一个家”,在周刊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用,随后江苏电视台和盐城电视台根据这篇通讯分别做了一档节目,在盐城乃至全省、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我在退休后曾被《教育周刊》聘为编辑。以往虽然经常采写新闻稿件,但用词不严谨,用字不规范,经常出现错别字。“当编辑马虎不得啊!”我经常提醒自己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随身带,还专门订阅《咬文嚼字》杂志。校对时,更是对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标点符号慢慢“抠”。

这些年,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整理红色故事、撰写记事性散文上,得到“两报”的关心和帮助,先后有近百篇文章被采用。2020年8月30日,《盐城晚报》用了整版介绍我《笔耕六十载不言“停”》的事迹,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。在报社历年举办的征文活动中,我多次获奖。这些文章的刊登和奖项的获得,成了我坚持写作的前进动力。步入老年生活,怀旧思乡之情成了我的创作素材,《老油坊》《小镇早市》等散文的发表,让我蕴藏在心头的乡愁、乡音、乡情得以释怀。《盐城晚报》建起“登瀛·文荟”微信群后,每天清晨,我打开手机就能读到当天刊登的美文,文友纷纷点评,互致祝贺,交流写作技巧,成为文友们尤其是老年人的“精神乐园”“老年人的福地”。



手足之情

哥哥的“跟班”

□陈峰

哥哥的跟班曾有好几个:他的孩子、天真可爱的孙女。可我要说的跟班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小他两岁的弟弟——我。

童年,我是哥哥的小跟班。20世纪70年代初,还没有分田到户。父母起早贪黑地劳作,很辛苦。照顾我的任务自然就交给我2岁的哥哥,哥哥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,兄弟俩形影不离。

上学后,我还是哥哥的小跟班。父母为了让我上学有人照顾,还要让哥哥带着我,哥哥8岁才上学,我是7岁上一年级,每天上学放学哥哥总是牵着我的手,生怕把我弄丢了。在哥哥三年级时爸妈让他留了一级,从此,我和哥哥兄弟俩就成了同班同学,从三年级一直同班到初二。在同班的几年里,哥哥一直很照顾我。我们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:上学前,我们兄弟俩的早饭自理;他站锅台,我烧火;他烙饼,我炕山芋。放晚学后一起帮父母到田地上浇水,我们浇过青菜、山芋、芋头、黄豆……小时候的生活场景还历历在目。后来,我们各自求学、工作、成家。我们现在住在县城的同一个小区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今年四月份,我体检查出患上肿瘤,医生要求先服药让瘤子缩小再手术。这一消息急坏了大哥,他茶不思、饭不想,在网上到处咨询查找对应病症及相关治疗方案,每天来宽慰我,并约好每天晚饭后出去走一圈。于是,我在服药阶段的每个晚上,都会到票友唱淮剧的地方,先听一会儿淮剧,再静候哥哥打来的电话。哥哥来了,与我一起听一段淮剧,这些淮剧都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经典唱段,如《吴汉三杀》《牙痕记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珍珠塔》等。听了一会儿,哥哥就让我跟着他走一走。

夏夜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,那熟悉又悠扬的淮腔淮调一路陪伴着我们,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喊着,建港沟的河面在月光下波光粼粼,在桥上夜钓的人们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垂钓的工具……绕过红绿灯后,来到金港湾西门表弟的店铺休息几分钟,再跟着哥哥继续前行。在向阳路与建宝路交界的路边,有一辆小型货车,车上摆着两种水果——葡萄和西瓜。哥哥问:“吃点水果吧?”我说:“不用!”但他还是坚持买了一串葡萄给我补充维生素,并抢着用手机付款。在以后的几天里,天天如是,我也懒得与他争,就做一件事:他买我吃。就这样,我又做起了他的跟班。

七月中旬,到了我能做手术时间,哥哥停下手头的工作,和其他亲戚一起陪我到上海中山医院。哥哥每天站在病房的科普走廊里学习术后护理方法,手术当天晚上,他坚持留下来照顾我:按着医生交代和他自己学习来的方法,隔一会儿帮我后背垫上枕头助侧身,隔一会儿帮我捏脚揉腿防血栓,隔一会儿用手摸我的额头测体温……躺在病床上的我,看着哥哥布满血丝的双眼、不知疲倦的身影,我的眼睛模糊了,此时我内心跳出一个声音:哥,等我康复了,还想做你的“跟班”。

现在,每个晴朗的傍晚,建宝路车站那一段的路上一定会看到我们兄弟俩的身影,也一定会听到我们一路的淮腔淮调,一路的谈笑……



思念无尽

母亲的行囊

□董素印

时光飞逝,思念倍增。

按照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习俗,母亲去世后的“六七”,是我们儿女和嫡系亲戚对她的最大祭祀活动日。从母亲去世之日算起,每七天为一个祭拜的重要日期,“六七”时,我们要再次举行祭奠仪式,还要将母亲生前的日常用品,特别是鞋帽衣物一并烧给她,以此表达对母亲的哀思、缅怀和纪念,这也是对中国农村丧葬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。

遵照母亲的遗愿,在她下葬后的几天,我们将她老人家生前用过的一些像样的东西“打包”,待“六七”时给母亲“送去”,包括寒衣、春夏秋衣、鞋帽袜子等十多个包裹,装满了一辆三轮车。想必这么多的行囊也足够她老人家“享用”一阵子了。

母亲的行囊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因为这些行囊中的鞋帽衣物,除了姐姐们平时给她添置以外,都是我们夫妇亲自给她老人家上街购买的。特别是我的爱人,她知道母亲平时喜欢淡雅整洁的穿着风格,知道母亲衣物鞋帽的尺寸,有时姐姐们买来的衣服母亲不一定合身,但我与爱人每次买回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挑选,是爱人用手反复测量过的,无论是颜色还是大小,母亲一看就喜欢,一试相当得体;唯一让她不满意的就是嫌买的衣物太贵了,说不适宜她的穿戴,但每次穿上新衣,她都要反复在邻居亲友面前炫耀夸赞一番,欣喜之情毫不掩饰。

我熟悉母亲行囊的另一个原因,就是每次母亲到她的其他儿女家居住时,都是我们亲自将她的衣物从衣柜中收拾出来,并开车将她和随身的行囊一起往返接送。母亲一生务农,直到十多年前父亲去世后,我们便“没收”了她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,让她随儿女们一起生活。她也毫不谦虚地对我们夫妇说,现在无牵无挂了,今后你们那里就是我的家。

在与儿女们一起生活的10年时光里,虽然不全居住在我们家中,但每次从她的其他儿女家中回到我们家里时,她总是说“在外面特别想家!”显然,在她的眼中,我们的家才是她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家。是的,在她老人家的行囊中,不仅有我们儿女给予的爱,就连我们的儿子儿媳也经常向老太太表达爱意。我爱人经常与母亲开玩笑说,在我们家又不给您开“小灶”,从没给予特殊待遇,与我们同吃同住,甚至有时忙起来连一日三餐都不及时,为什么还喜欢这里?母亲总是说:“这么多年来,你们俩不仅处处关心照顾我,孙子孙媳妇也经常回来看望我,就连重孙子们也都将好吃的带给我,向我嘘寒问暖,这样的好生活谁不喜欢?”母亲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今年五月,母亲刚过完九十岁生日不久便离世了。去年,她查出得了肺癌,经过及时医治和细心调理,终于躲过了一劫,并基本恢复了健康。不巧的是今年初春又查出患上其他毛病,好在暂时不怎么疼,便又到姐姐们家去了。不久,母亲又感到身体不适,便催促姐姐们将她送了回来,回来后身体一直不怎么硬朗,我们动员将她再次送进医院治疗,她怎么也不肯去,叮嘱我们一定要让她在家里寿终正寝。考虑到她老人家年事已高,体内已多次出血的不良症状和精神状况,只得遵从她的意见,满足了老人家的最后心愿。临终前,母亲没有半点怨言,只是反复表达对儿女们的无限谢意,她越是如此,越让我们倍感惭愧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在老人家的病床前,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,哪像她当年养育呵护我们那般细致!

“六七”那天,我们心情沉重地将母亲的全部行囊送走,相信老人家一定会高兴吧。但愿天堂无苦痛。